

文章编号: 1671 - 1653(2006)02 - 0062 - 04

新时期文学创作对 17年文学传统的悬隔与会通

——从刘勰的“通变”思想谈起

徐宝锋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18)

摘要: 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所提出的“会通适变”思想出发, 探讨并阐明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对于17年文学传统的会通与悬隔问题, 在充分肯定新时期文学创新成绩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指明了新时期文学由于缺少17年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民族、国家、集体主义体悟和关怀而造成的精神蜕变。进而认为, 17年文学那种朴实、自然、真切而崇高的情感取向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学正变的基础和前提。

关键词: 刘勰; 通变; 17年文学; 新时期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The Continuity and Separation between Literary Tradition of Seventeen Years and the New Period Literary Creation

——Based on the Argument "Continuity and Mutation" by Liu Xie

XU Bao-feng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rgument of Continuity and Mutation by Liu Xie, which is put forward by him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There are continuity and separation between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17 years and the new period. To make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period more creative and inspiring, we must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llective thoughts and nature feelings expressed by the classic writings of the 17 years period.

Key words: Liu Xie; Continuity and Mutation; the literature of 17 years period; new period literature

通变, 本是我国古代哲学的范畴, 源于《周易·系辞上》: “极数知来之谓占, 通变之谓事。”韩康伯注: “物穷则变, 变而通之, 事之所由也。”孔颖达疏: “物之穷极, 欲使开通, 须知其变化, 乃得通也。

凡天下事, 穷则须变, 万事乃生, 故云‘通变之谓事’”。它揭示了宇宙万物间变化和静止、对立和联系、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揭示了事物运动发展的特征是新旧更替和新旧贯通的统一。刘勰在《文

收稿日期: 2006 - 03 - 04

作者简介: 徐宝锋(1974—), 男, 河北承德人,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中心文艺学专业2004级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与诗学研究。

心雕龙·通变》中将古代哲学与古代文论有机结合,开始把通变这一哲学概念应用于文学领域,用以研究文学的发展和创作规律。

刘勰认为因文明道方能旁通无滞、变通会适,文学要在“征圣宗经”而取熔经意的基础上自铸伟词,进而提出了关于文学继承与革新关系的科学命题,探索出了文学创造和文学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把握文学创作的正途与文学批评的准则。在刘勰看来,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就其不变的实质而言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现象而言为“变”。“通”与“变”对举成文,指文学发展过程中矛盾的两个方面。刘勰的文学“通变”观,是他辩证地分析文学的继承和革新、规范和创造、法则与变化等关系的基本观点。深入把握刘勰“通变”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17年文学传统的辩证关系。

一、会通思想与17年文学传统

刘勰对于文学创作有一个生动的譬喻,他认为“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立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文心雕龙·通变》)也就是说,作品好比草木,根和干都长在土里,但是花叶气味却因为吸取阳光的差异而显出不同的品种来。文学创作所必须的真实而诚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是不同时代文学之所以能够会通的共同土壤,是文学会通的前提和保证,是优秀文学精神传承的重要凭依。在面对优秀的文艺精神传统,也就是“宗经”的问题上,应努力克服因忽视传统颐养而造成的“浅”和“讹”的毛病,做到“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文心雕龙·宗经》)“情深”、“事信”、“义正”应该成为评判文章优劣的主要标准,只有在此会通思想的指引下,文学创作才能从经典传统中获得艺术颐养,更好地实现内质美和外质美的统一,达到正确健康的思想蕴含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最终成就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17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童年时期,同时也是之后文学发展的重要精神源流。这一时期的诸多经典,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最为基本的真诚、高尚、乐观的精神基调,提供了之后文学发展的“有常”的艺术颐养。去除那些存在于17年文学

作品中的陈词滥调、去除那些过时的政治教化和口号,超越那种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所作的单纯否定,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具有经典品格的艺术生命。这种生命力来自于这一时期的创作者把自己的生活关照和创作实践同整个民族的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在于创作者主体与整个民族的思想感情、道德评价以及价值观念的相互融合,在于一种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的崇高精神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支撑下人们普遍获得的超凡品质和人生极致。随着历史逐渐远去,随着那个独特历史时期轮廓的日渐清晰,在自我价值的日渐迷失的当代文学话语语境中,会通17年文学这一重大思想源流具有重要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史意义。17年文学作品渗透的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思考有助于推动新时期以来的创作者重新思索生活的价值、审视人生的意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对于民族和事业的责任感,诸多17年文学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应该为我们的每一个作家认真理解吸收。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将17年文学作为创作的强大的精神思想武库,应该把其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重要的传统加以会通和学习。

文学应该于社会有用,文学应该深入生活,干预生活。在对于长期颇有争议的17年文学传统问题上,应摒弃那种极端片面的否定态度,用辩证的历史之思弥合“文革”这一独特的政治存在造成的断裂(虽然很大程度上具有积极的意义),进而消解由于对于17年传统的解构而导致的文学创作上群体意识的迷失。有效“会通”17年文学传统将成为我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所在。

二、适变原则与新时期文学转型

刘勰肯定文学因时代乃至作家自身变化会呈现出的日新月异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文学创新的问题,明确提出了适变原则。“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诂。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隳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心雕龙·通变》)他认为文学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应“矫讹翻浅”,遏制“从质及文”的非正之变。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应该在“征圣”、“宗经”,在会通传统获得艺术颐养的基础上,大力提倡“执正驭奇”之“正变”。“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

《骚》命篇者,必归艳丽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蕴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枯木无阴,自然之势也。”(《文心雕龙·定势》)雅正的思想蕴涵,应该永远作为立文变化的依据和精神凭依。传统经典中抽绎出的真实、雅正、要约的创作通则,应被作为正变的准绳大力弘扬。在刘勰看来,任何割裂文学传统的创新都不会具有绵远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

遵循刘勰的“适变”原则,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来考察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毋庸置疑,新时期文学创作呈现了“变”这一日新月异的鲜明时代特色,满足了时代对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新的需求。在突破旧有的创作模式和单一的艺术色调的基础上,满怀文学才华和艺术憧憬的各路作家纷纷施展自己的才能,发觉并描绘自己身边的生活,通过追求艺术个性的张扬实现着文学的自觉。在这种自觉发展的过程中,现代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传统在文化性质和审美方式上不可避免发生碰撞和连接;魔幻现实主义、结构主义、感觉主义、黑色幽默、荒诞、寓言、象征、解构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因素的整合渗透,伤痕、反思、寻根、改革乃至先锋作家的系列创作都展现和预示了文学的繁荣,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对于文学本体的探究,提高了创作和欣赏的兴趣,突破了旧有的文学格局。在自觉诉求文学审美的多样化选择的过程中,新时期文学在创作实绩上完成了艺术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表达方式的变革,在艺术思维方式上冲破了机械反映论的格局,通过对于现实的迷惘感、荒诞感、神秘感的强化实现了客观性的外在描写向主观性的审美倾斜,通过并置不同时空、消解逻辑联系的手段拓展了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空间。但是,在这日渐个人化的写作浪潮中,文情重心完成了由集体崇高向个体感悟书写的下移,日趋细腻、精巧、主情主义的形式化创作导致价值、理性、意义的纷纷瓦解。17年文学所具有的宏大的民族、国家、集体主义的体悟和关怀,英雄主义的悲壮情怀逐渐地被个体自我缜密细腻之思所替代。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创作风潮在怀疑、否定、批判传统文化的精神的过程中,正在通过迷惘、焦灼、愤世的情绪抒写方式迎合着日渐世俗化、市民化的审美追求。

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以绕开或者超越传统文

学的心态追求文学创作的日新月异,这种变化在表达他们对于个体生命体验的尊重的同时,也表现了在文化危机和物欲横流的双重危机下当代国人的思想情绪,描写出了人们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变革中的两难处境,在深刻的精神危机中对于自然的渴望,对于生存意义的找寻。以个性意识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基点的对于既存的文化秩序的反抗和对于生存困境进行思考具有重要的文学新变的价值,但在揭示因袭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中的不合理因素的过程中,如果过分迷恋于构筑个体的内在经验和精神幻象,并把这种个人化的经验推向极端,就会使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怪异的幻觉和本能的宣泄歧途上越走越远,从而步入畸变一途。“辨丽本乎情性”“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心雕龙·情采》),新时期文学转型要在真实、雅正和要约等文学创作通则前提下进行,在求新求变的同时,不应忽视或遗忘17年文学雅正的精神传统。在肯定文学新变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人们对文学的艺术规律和形式技巧成功探索基础上,应该力矫文学繁荣发展背后的一些流弊,进而在会通17年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满足我们内心深处呼唤崇高精神的强烈愿望,创作出更多的“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辨骚》)的优秀作品,达到奇与正、华与实的辩证统一,达到在完美雅正的思想内容和奇伟形式的完美结合,而非偏执一端。籍此,我们便可以实现新时期文学创作在“正变”过程中获得经久弥新的艺术生命。

三、凭情负气与艺术生命

刘勰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获得艺术生命的关键在于“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文心雕龙·通变》),情与气,既是文学创造行为的直接出发点,又是沟通传统和独创之间联系的中介。

“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这两句互文见义,说的是“凭情负气以会通”和“凭情负气以适变”两层道理。“凭情负气以会通”,就是作家从自身特定的“情”“气”出发,自然而然地追寻文学传统,完成对个性的艺术的炼造。每个人都应探寻适合自己性情的传统。“凭情负气以适变”,则是再由传统返归于个性,任传统启迪个性、熔铸个性、提炼个性,直至张扬个性,真诚地抒发“情”“气”,适应时代审美需要,以新的艺术个性来丰富和发展传

统。很显然,“情”“气”在这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它既是作家追溯传统源流藉以获得艺术赅养的先决条件,也是作家摆脱传统拘束以实现艺术独创所必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文心雕龙·情采》),丰富、雅正的情感是作家舒展自己艺术个性的前提和保证。任何艺术创新都应在融合作家丰厚、雅正情感的基础上进行。追求形式美不是缺点,但是要有真情实感,要言之有物。应当追求新奇的风格,但不能完全忽视文体和道德规范,因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历史的继承性,都要在表达思想感情的基础上去继承和创新。文章的写作应该“还经宗诂”,进而能够达到“衔华佩实”的理想境界。

诚然,历史留给人们的怀疑、否定、批判、压抑以及现实赋予人们的迷茫、焦灼、愤世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使痛苦、阴郁的情感体验和新时期的创作主体相伴随。这些对于人生、社会、存在的怀疑和荒诞感使新时期作家的作品凸显了一种相对于传统观念的变异。这种变异固然形成了向传统观念的挑战,但形式的意义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过分地强调表面上的现代意识,不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不去谋求某种深层的融合,势必导致文学创作因同现实以及文化传统发生断裂而丧失生命力。由此,优秀的作品“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梗,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情采》)在张扬个性,追求完美形式的同

时,对深厚的精神内涵以及健康人文精神的谋求,应该成为文学生命的必然选择。能够“持人情性”的“无邪”之思,“质而不野”、“莫非自然”的感情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者的自觉诉求情感,这样才能最终做到“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涸。”(《文心雕龙·原道》)使文学焕发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所以,新时期文学创作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必须吸收本土文化的生命之源,立足于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精神的根基上,对现代主义作宏观的理解和融合。17年文学那种朴实、自然、真切而崇高的情感取向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学正变的基础和前提。跨越10年文革给我们造成的历史悬隔,会通17年的经典传统,我们所获得的启示应该是鲜活的。一方面,文学创作应该摆脱单一的社会学创作批评模式,实现对于文学价值的自觉诉求,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努力重现传统的审美经验,复活我们民族历史的审美意识,给新时期文学创作注入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美学情韵。当前的文学创新应该从整个民族精神的弘扬,崇高价值观人生观彰显的角度重新审视,一度为极左的文学政策扭曲的英雄形象和群体荣耀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提及。文学在强调求新求变的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正确的方针和创作路线的指引下,应该进一步使作家们深入理解文学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最终审美价值达成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周易·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2]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牛运清.中国当代文学精神[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 [6] 吴炫.新时期文学热点问题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7]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8] 范文澜.文心雕龙义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9] 胡经之.中国古典文学学从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0] 张少康.先秦两汉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